

【党建热点】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价值意蕴、问题检视与实践进路*

刘 艳

摘要: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是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加快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基层执政基础的固本之策,也是提振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兜底”工程。政治制度缺失及运转失灵,一些基层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滋长,传统社会礼俗仍产生影响,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域伦理道德体系新旧更替的影响,是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仍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全面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容低估,必须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微腐败治理“系统化”、从严治党“刚性化”、管党治党“法治化”和舆论监督“常态化”。

关键词:政治生态;问题;原因;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3-0006-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并作了大量重要论述。他强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①,“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②。基层党组织的性质、组织特点及其在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在全党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兜底”功能,是全党政治生态体系的关键层。新时代,实现全党政治生态根本好转的战略目标,必须系统推进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力求“既解决老问题,也觉察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③,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一、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

基层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场域,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肌体神经末梢和执政根基。基层党内政治生态

直接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从政取向、价值追求和工作风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系统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1.是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加快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④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环节,是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基层群众、推动基层治理、保持基层社会活力的重要组织。大力强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和自我提升能力,消除基层党组织官僚化以及领导力弱化、虚化、边缘化等痼疾,推动基层党的治理科学化、体系化、现代化发展,是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有序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必要保证。

2.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基层执政基础的固本之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收稿日期:2021-09-0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文化向度研究”(18CKS044)。

作者简介:刘艳,女,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照 276800)。

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⑤。这一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自己的法定职责(即党章规定的职责)而内在蕴含的生命力、对内开展党内活动、对外处理与群众关系的能力”^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必须依托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内增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规约、监管,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提高基层党员干部服务人民的自觉性;对外增强基层党员干部团结动员基层群众、凝聚服务基层群众的亲和力,改善、融洽基层党群干群关系。

3. 是提振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兜底”工程

政治生态是一个环环相扣、完整系统的生态链条,由诸多基层政治生态子系统组成。根据层级和影响的不同,政治生态可分为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态、省(市)级层面的政治生态、县级及以下层面的基层政治生态。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态与省(市)级层面的政治生态能否正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治生态系统的状况。^⑦风清气正的基层党内政治生态能为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基础。相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畸形发展,会由下向上蔓延乃至引发省(市)级层面乃至国家层面政治生态的蝶变反应以及裂变式扩散,最终导致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崩溃。

二、当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强基固本,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显著,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基层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然而也要看到,当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仍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发、量大面广。”^⑧具体而言,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不良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层“微腐败”现象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面提速,涉及基层拆迁征地、惠民惠农、城中村和旧村改造等项目的集体资产迅速聚集,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把公共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

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卡要”^⑨,此类“微腐败”现象亟须彻底根治。基层“微腐败”现象的隐蔽性、传染性、腐蚀性极强,是基层党内政治生态最致命的“污染源”,严重削弱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侵蚀党的基层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苍蝇’的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⑩

2. 基层党员干部“庸懒散浮拖”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的侵袭,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在岗位上混日子,热衷于“打太极”,有的基层党员干部存在治理能力“庸”、办事态度“懒”、工作作风“散”、责任意识“浮”、履职落实“拖”等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有的基层干部沦为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太平官”“糊涂官”“庸懒官”。诸如此类“庸懒散浮拖”的顽瘴痼疾,体现的绝不仅仅是能力问题、作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严重影响着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极大抹黑基层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致使党群干群矛盾激化。此类现象对基层党内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是我们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高度警惕、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3. 基层圈子依附“隐形化”“变通化”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地明确提出,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⑪。然而,囿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封建糟粕因素的影响,厚重的乡里情结、宗法传统等现象在基层圈子当中仍旧不同程度地存在,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甚至趋向“隐形化”和“变通化”,衍生出家族化、圈子化、帮派化的个人政治庇荫关系网结构。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中,“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⑫。隐含于家族化、派系化、圈子化之中的权力依附、情感投资,致使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任人唯亲、是非模糊、权力过界,一定程度上造成基层党内关系江湖化、庸俗化和随意化,严重损害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严重腐蚀基层党内政治生态。

三、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原因

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 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及运转失灵

从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制度不够完善以及正式制度失灵与虚设为基层党内不正之风提供了滋长空间。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一些地方基层党员干部在征地拆迁补偿、低保审批等资源调配、权力行使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些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权力过度集中以及权力的制度性约束不足,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暗箱操作提供了“弹性空间”;基层党员干部任用考核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合力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导致上级监管缺位、下级监督缺失、同级监督乏力,为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投机钻营提供了保护伞。此外,基层工作环境苦、事务杂、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加之基层干部队伍基数庞大、平台起点低、领导岗位少、上升渠道窄,晋升不免存在“天花板”效应,产生职业倦怠和“补偿”心理,为一些基层干部“庸懒散浮拖软”和微腐败埋下了伏笔,致使一些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免疫、自我调节、自我修复机制出现“中梗阻”。

2. 一些基层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滋长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市场意识与经济理性悄然蔓延至基层社会生产领域。基层社会在其经济活力被激发的同时,原有的社会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主体物欲膨胀、经济理性异化致使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名利观、金钱观出现错位。尤其是随着大量扶贫救济款和惠农资金等国家公共资源、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向基层倾斜和输送,基层社会资本流动日趋活跃,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滋长,把公权力作为博取个人收益、实现个人意愿的筹码以权谋私,支配、寻租甚至买卖公共权力,导致公权异化,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和错位,背离了公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正如郑永年指出的:“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不断地侵蚀着道德主义。”^⑬而在大量国家资源向基层倾斜的过程中,由

于基层领导干部在资源与款物的分配、资金的管理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基层不均衡的权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下,基层政企之间以及基层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资源依附关系被强化。在理性人动机的驱使下,少数基层干部出现了与当地企业主、其他利益团体共谋私利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缔结形成官商利益同盟圈。他们“在经济上相互牵连,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地方组织结构变成了‘施恩者’与‘效忠者’之间的私人政治”^⑭,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社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造成基层社会关系内在紧张。

3. 传统社会礼俗仍产生影响

一些地方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不良现象的存在与其所根植的独特社会土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存在浓厚的乡里情结、人情面子与宗族观念虽然历经现代化浪潮的冲击,维系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礼俗秩序不断衰落,但其依旧是影响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重要因素。林语堂曾说,“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⑮。依靠礼俗秩序而非法治维系下的基层政治生态运行模式,更为关注人情关系的远近亲疏以及行事的互利性而相对忽视制度和法理契约。另一方面,当前部分地区城乡差距、身份差距、区域差距尚未完全消弭,社会不公问题时有发生,各行业游离于法律法规之外的“惯例”“行规”“潜规则”尚未彻底根除。这些“惯例”和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层民众的心理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基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致使部分基层民众的判断力、批判力和自主性钝化,政治冷漠情绪弥散。

4. 文化领域伦理道德体系新旧更替的影响

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思想体系,文化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深刻影响并渗透至基层民众生活。一方面,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流变以及外部文化的传入与渗透,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伦理规范、道德教化和价值引领作用日趋式微。而传统文化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人治文化以及宗法观念、尊卑等级、裙带关系等封建文化糟粕却在偏远基层仍产生影响,传统文化中精神和道义的“边缘化”与庸俗落后道德文化的“挣扎”给基层党内政治生态“逆生态化”发展提供了文化观念支持。另一方面,在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传统的乡约民规与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被打破,基层社会原有的伦理道德本位意识和静态社会秩序逐步消融,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法律、契约规范尚未建立。社会转型期伦理道德观念的新旧更替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外,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市场经济伦理价值观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伦理价值观,影响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作出正确的伦理道德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潜规则、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腐朽低俗的政治文化乘虚而入,加之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想的冲击,少数基层党员干部世界观和价值观出现紊乱,有的甚至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走上搞变通、捞实惠、以权谋私的歧途。

四、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进路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治,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1.“微腐败”治理系统化:建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维机制

其一,强化基层监察组织建设,形成不敢腐的正式约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至县级监察委的监察范围之内。基层县级监察组织是微腐败治理的实施者,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治理微腐败,必须以其为坚强后盾,监督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及权力的良性运行。县级监察委应积极通过向辖区乡镇、村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员,以交叉式、组合式或嵌入式督查方式专责履行基层监察职能,形成覆盖县、派驻乡镇、街道、村的纪检监察组织网络,彻底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线传导”监察工作模式,形成上下联动、多维共振的监察格局,有效激活基层监察“神经末梢”,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破解基层监督力量缺位、失位、错位难题。

其二,强化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前馈控制和防范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⑩当务之急,应通过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地方性法规,明确基层

党员干部的职责定位及其在集体资产处置、土地征用、项目招投标、宅基地审批、扶贫资金认定、低保审批的资源调配和权力行使上的裁量权限,最大限度地挤压微腐败的滋生空间;通过探索推行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各项事务的责任主体、运行流程、风险防控等,确保基层党员干部“照单办事”“按图操作”;通过完善基层“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基层扶贫拆迁等重大事项公开制度、基层官员述职述廉制度、干部民主评议制度,推进基层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约基层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

其三,发挥基层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力、驱动力、内化力作用,形成不想腐的非正式约束机制。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是最深刻、最稳定、最深远的。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深入挖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政治文化”^⑪，“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⑫,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高度重视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加强廉政文化警示教育,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党规党纪宣讲以案释纪,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廉荣贪耻的行政伦理观念和廉洁价值观,以伦理道德责任和廉政责任的价值理性构筑自觉自省的微腐败“免疫系统”。

2.从严治党刚性化:严把“选拔任用关”“作风关”“管治关”

其一,严把基层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关”。从严治党重在从严治吏,基层从严治吏必须“要把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作为刷新吏治的核心”^⑬。严格规范民主选举程序,落实基层“三级”联动提级联审以及村“两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防止并坚决查处以贿选等不正当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基层换届选举的行为。严格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严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旗帜鲜明地树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廉为基的用人导向,净化基层选人用人政治生态,防范不合规定的“外挂”“空降”等变相侵占基层晋升指标的现象,力争选拔出政治过硬、群众威信高、熟悉社情民意的基层干部,严防基层党员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以及涉黑涉恶、涉邪势力侵蚀基层政权。精准落实《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关注工作

实绩,打破基层党员干部职级晋升的“天花板”,确保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让那些吃苦的人吃香、实干的人实惠、有为的人有位,让广大干部专心谋事、用心做事,在干事创业中求进步、求发展,有盼头、有劲头。

其二,严把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关”。基层党员干部作风是关乎人心向背的第一道防线。既要继续深入开展党性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进基层党员干部作风转型,又要专项整治清除基层“四风”顽疾及“庸懒散浮拖”等作风软肋,尤其是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进行重点查处,“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决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②0}。

其三,严把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重点岗位、重点对象、关键环节的“管治关”,加大问责和惩戒力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铁高速路征地、水利设施建设、国土整治等项目征地拆迁领域,农业、林业、水利、城建扶持的惠民惠农资金领域,土方工程、附属工程和还建点建设工程等集体工程建设领域,紧盯截留挪用资金、虚报冒领资金、违规享受政策、拉票贿选、权力寻租等关键问题。严抓基层领导班子的“关键少数”,将基层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街道)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行政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村(居)委员会成员列入扩大巡察的对象范围之内。灵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惩腐肃贪,彻底根除影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毒瘤、病灶。

3. 基层治理法治化: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其一,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依循法治方式的基本要求,掌握权力运作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矛盾纠纷时,必须树立法治观念。“潜规则”“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等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常见病”,是人治思维、特权思维的典型体现,是法治信仰缺位和法治思维缺失的集中反映。要彻底扭转这一现状,基层党员干部必须坚定法治信仰,把法治思维作为执政新理念,牢固树立权由法定、权依法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法治理念,绝不触碰法律底线、逾越法律红线,共同营造遇事找法、办事靠法、化解矛盾依法的法治氛围。

其二,必须严格依靠法律法规处理问题,通过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成文制度、法律强化权力行为的授权性、合法性和程序性。法治方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规则和程序消除与法治思维相悖的处事模式,如遇事绕过法律制度和正当程序直接托关系、找门子。作为基层权力资源的执掌者,基层党员干部被裹挟于基层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复杂关系网中,必须时刻秉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一言以蔽之,基层党员干部只有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常态化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判、处理问题,把法律的形式性、程序性和一般性内化为道德自觉,把对法治和法律的敬畏外化为行为方式,才能推动政治生态建设实现从“抽象”到“具体”、从“人治”到“法治”、从“运动式”到“常态化”、从“阶段性”到“确定性”的治理模式转型。^{②1}

4. 监管监督常态化:构建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责任监管体系

深度拓展基层监督监管渠道,强化基层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合力,探索构建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责任监管体系,形成监督问责新常态,既是推动基层政治体系良性运转、构建风清气正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助推力,也是实现基层社会生态与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之间“合生态性”共融互洽的契合点。

其一,推进党内监督常态化。必须向细处下功夫,既要抓早抓小,紧盯基层党员干部易触碰、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避免小问题激发大矛盾,又要抓常抓实,通过常态化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性谈话函询、不定时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责任、促进担当。

其二,推进群众监督常态化。积极培育基层群众的参政意识和监督理念,健全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机制,保障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利,扩大基层群众的参与范围;强化基层(村民)监督委员会建设,完善群众定期评议机制,将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治理成效交给基层民众评判;公开群众监督电话、举报平台,融意见投诉、问题处理和群众监督为一体,多渠道、多角度听取基层民众声音。

其三,推进全媒体舆论监督常态化。作为现代化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舆论监督的发展程度与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与水

平及其政权的群众基础的广泛程度。^②推进全媒体舆论监督常态化,应积极打造“三资”信息化监管和公共资源交易网络平台,对涉及工程管理、采购管理和“三资”管理等基层事务以及集体产权出租、转让、抵押等流转交易进行动态、全面监控及公开,化解基层民众与基层社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确保基层各类集体资源、资产在市场经济交易的有效监督中得到优化配置,从源头上扫除监督盲点。打造民生服务应急联动网络平台,推动政府热线与民生热线服务并网运行,针对涉及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定期组织相关部门领导现场释疑解惑,有效提升民生服务效能。构建“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现代新型举报受理办理体系,畅通信访监督绿色通道,及时披露基层“四风”问题和违规违纪行为。

注释

①⑨⑫⑬《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193、105、74页。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2月28日。③⑤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01、51、49页。④习近平:《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⑥王同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⑦杜治洲:《改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治理“微腐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11期。⑧⑩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⑬郑永年:《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令人忧虑》,《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⑭张新光:《“内生腐败”及其成因》,《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⑮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⑯《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45页。⑰李学同、陈金龙主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页。⑱王儒林:《在全省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山西日报》2014年12月2日。⑲《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⑳刘艳:《“中国梦”背景下作风建设的主要困境及其改进理路》,《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㉑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责任编辑:文武

Optimizing the Grassroots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y: Value Implication, Problem Inspec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Liu Yan

Abstract: Optimizing the grass-roots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not only a fundamental policy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ut also a fundamental project to boost the whole political ecosystem. The lack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operation failur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interest desire of some grass-roots cadre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social etiquette and custom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placement of the old and new ethical and moral system in the cultural field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some adverse phenomena in the grass-roots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y. The difficulty, complexity and long-term nature of comprehensively optimizing the grass-roots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y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We must implement accurate policies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icro corruption governance, the "rigidity" of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he "legalization" of Party governanc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Key words: political ecology; problems; causes; practice approach